

近代外国在华
文化机构综录

主编 郭卫东 副主编 刘一皋

近代外国在华 文化机构综录

撰写人员 郭卫东 刘一皋 王霞 梁军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唐克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摘录

郭卫东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5 字数 452,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1559-7/G·233

定价 21.50元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录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有关条目 2627 条。包括：宗教类（基督教新教差会、天主教修会、东正教有关机构、教堂、教区、地方性教会、日本神道及其他宗教机构）；教育类（大、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外童学校及宗教教育机构）；新闻出版类（外人在中国创办的中、英、俄、法、德、葡等文种的报刊，广播电台及出版发行机构）；医疗慈善类（医院及福利、救济性机构）；社会文化类（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社团及学术科研和娱乐性机构）。

二、本书所用近代的概念，指 1840 年至 1949 年。因叙述对象为机构，有个完整性的问题，故少量机构在时间上有超前和逾后的情况。历史纪年，一般用公元纪年。

三、对某些外国文化机构不进行全面的解释，如某些教会机构，对其在外国活动的历史和现状解释从简，而着重阐释其在华的情况。

四、释文中的古地名，一般均夹注今地名。

五、书前刊有词目表，按词目第一个字的笔画数编排，画数相同者按起笔笔形一丨丿、一（包括各种折笔）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词目，字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字数相同的，按第二字笔画和起笔笔形排列。

六、正文中一般不出现外文原名，但在书末附有《中外机构名称译名对照表》（按中文笔画编排）；《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按英文字母顺序编排）。另附有分类词目索引，供参考和检索。

七、译名采用较通行译法。有些外文名称，我们尽量查找到中文原名，以求中外名称统一，但也有一部分查找不到，只得依外文原称音译和意译而成。

八、因受资料限制，部分机构未能注明结束时间。

前 言

—

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既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实体。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非自近代始。鸦片战争以前，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成规模地传入中国，就达三次：是为唐朝的“景教”（基督教会中的“聂斯脱利会”）；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天主教会中的“方济各会”、“本笃会”）；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主体为“耶稣会”、稍后也有“巴黎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等）。这些教派团体进入中国，以传播宗教为主，同时也连带传入了西方的文化和科技知识，其中尤以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们劳绩最大。对此，史家早有定论，不赘。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根本性逆转。列强的军舰大炮将前此中西交往中的正常对等态势击破，中外关系步入了一个非正常非对等的失衡期。这以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便明显地带有了侵略色彩。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凭藉着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始终占据了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军事、经济侵略同时并行，而且，文化侵略还往往扮演着“先锋前驱”的角色，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亚于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批地设置外国的文化机构，即是这种侵略的表现之一。从1840年到1949年，外国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难以胜计，据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报称：至1920年，基督教新教教会共在华设立差会总堂1037所、正式教堂6391所、初级小学563所、高级小学962所、中学291所、医院326所、药房344所。需要指出的是，上列数字只包括新教系统，

而不包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和不属于教会的外国政府、团体、个人，这后几个系统在华建立的文化机构，其数目当远远超过新教系统。由于资料的缺乏，要想完整地罗列这些机构非本书力所能及。本书主要着眼于某些影响较大的机构类别，在教会机构方面，着重差会和修会，共收录新教差会条目 180 余条，天主教修会条目 150 余条；在教育机构方面，着重高等教育机构，共收录各类大学条目近百条；在新闻出版机构方面，着重报刊，共收录外人在华创办报刊条目 540 余条。至于大量存在的教堂、中小学、医院和其他文化机构，则择其规模较大、特点突出、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和有历史资料可循者予以选录。不言而喻，这与“收罗备至”的标准相距甚远，所收条目有许多也很不严整。但或可在某个部分上反映出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门类繁杂和数量众多。

这些数量惊人的文化机构曾无远弗届地深入到中国的各个省区，包括那些外国军事、经济势力尚未及的地区。有资料表明，1919 年，在当时中国 1704 个县中，除 106 个县外，都有外国传教士在活动，都设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相应机构。通过机构在各地的设立，可以概见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作为外人最早盘踞地的澳门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的广州，也较早地出现了各类外国文化机构。1843 年，上海开埠，迅即成为列强在华势力最大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外国文化机构，无论在数量、规模和影响上都为别的地区所无法比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扩散的要冲。其他如天津、武汉、哈尔滨等口岸城市也是外国文化机构集中的地区。各国机构的设置还与其在华划定的“势力范围”有关。英国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设有较多的文化机构；俄国东正教会的活动主要偏重于东北和新疆等地区；德国的机构则多见于山东等省区。这种地区分布又以各国在华势力的消长互替为转移。如中国东北，1895 年前，出现的主要是英国的机构；其后，日本、俄国的势力渗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成为日本机构的一统天下。台湾的情况亦复如是，只不过比东北地区更形明显，自 1895 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岛上的各类文化机构便基本由日本所控制。台湾、香港、澳门还另有一点特殊性，就

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在中国大陆设立各类文化机构基本不复存在,但在台、港、澳地区反倒急剧增加,其中有许多是原先在大陆机构的延续,迄今仍影响很大。

近代中国曾惨遭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共同侵略,国别不同,特点也各异。瑞典、丹麦、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其对华的军事、经济侵略并不太显著,但在对华的文化侵略上却不输于其他列强,这从它们在华设立的大批文化机构上得到了反映。法国的文化侵略,由天主教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其机构遍及中国各个省区,且劣迹昭彰,近代的中外民教冲突多数与它有关。英、美两国是新教教会在华势力的最大背景国,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地位又超乎英国之上,它们经费充裕,来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众多,所设机构多虚饰以较强的“纯文化”色彩,并注意在中国社会上层活动。日本在华各类文化机构大多由政府直接设置,带有赤裸裸的殖民文化的特性。俄国在华机构同样多数具有“官方”色彩,1917年后,又具有“侨民文化机构”的特征。

外国在中国的国土上设立文化机构,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们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超出中国政府的管理范围,对中国主权构成严重侵损。它们在“基督占领中国”、“西学优于中学”的旗帜下,以外来文化强烈排斥中国本体文化,对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形成全面冲击,并助长了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恶劣的社会心态,培养了奴化人材。毛泽东有言:“传教、办医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即是指此而言。它们将大炮、鸦片和传教联为一体,对中国实行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造成极大伤害。它们组成一幅庞大而又严密的网络,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教育、新闻、出版、文艺、体育、学术乃至国民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等等)进行无所不及的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透干预和操纵控制，从而加快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和部分地区殖民地化的过程。

二

应该确认，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都始终笼罩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之中，不看到或者否认这个基本事实，便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文化的交流与政治、军事的对抗毕竟分属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对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如果一概视之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那也未免太简单化了。无可讳言，它们还有着另一个方面的功用。

外来机构即是代表着“另一种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那么，它们所输入的某些“信息”对仍处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就应该是新鲜的带有近代意味的，所创立的一些新型机构样式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教育领域，1839年11月4日，澳门出现了第一所外人创办的比较正规的洋学堂（马礼逊学堂），它也是在中国最早实行近代学制的学校，所开课程有：物理、化学、体育、英语、几何、生理学、汉语等，多数为中国旧式教育机构所未开设，从这里还走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欧美的学生——黄宽、容闳，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输送留学生的先河。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裨爱利莎在广东设立女塾，为中国大陆出现最早的女子学校，其后，又有一系列外人兴办的女校出现在中国各地，其著名者，有上海清心女校、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塾、北京贝满女校、福州文山女塾等。而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经正女校，则晚至1898年才出现。至于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女校更在1908年才建立。向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打开接受正规教育的大门，对千百年来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人，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说。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也是首先由外人涉足，1879年建立的圣约翰书院，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大学；1904年，基督教新教差会又在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到1949年，仅新教教会在华创办并形成规模的大学就有13所，这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生发展

不无影响。

在新闻出版领域,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刊物。我国近代报刊发端于外人,1827年11月8日,由怡和洋行经理马地臣创办的《广州记录报》,为在华的第一份英文刊物;而1833年至1837年间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是外人在中国最早创办的中文杂志。鸦片战争之后,外人在华所办报刊数量骤增,日报、早报、晚报、画报、副刊、号外、广告报、商情报、航运报等各报种异彩纷呈。与报纸兴起相联系的是新闻通讯社,1872年,英国在上海设立路透社远东区分社,自此操纵中国新闻市场达62年。继路透社之后,法国哈瓦斯社远东分社、美国合众社远东分社、日本电报通讯社台湾分社等也陆续建立。与此相比,国人自办通讯社开始于1904年,且规模很小,直到1922年,才有中国自己的全国性通讯社——国闻通讯社的出现。在出版方面,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西书译书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该机构也被认为是外人在华创办的最早企业。外来出版机构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还引进发明了一些新的技术,如美华书馆曾发明电解法铸造汉字字模和部首排列汉字字盘,而天主教土山湾印刷所则在中国最早采用了石印术。广播电台也是近代兴起的新闻传播的重要形式,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是1923年1月由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所创建,名曰“空中传音”,它比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新新百货公司的“无线电话台”要早出4年。报刊、通讯社、出版社、广播电台是近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的出现,加速了信息传递,扩大了传播范围,在缩小世界的同时也缩小了人际的距离。

在医疗领域,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就在澳门开设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圣辣非医院。1835年11月4日,美国人伯驾又在广州开办了新豆栏医局,这是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著名的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博济医院又进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医校——南华医学校,以及中国最早的西医医学刊物——《广州新报》(后改称《西医新报》),如此一来,就把新的医院制度、医术医药、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医护宣传联为一体了。外人在华开办医疗机构出

于不同动机,但客观上把一种全新的医疗体系——西医传入中国,应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在社会文化领域,晚清以前,中国还没有成为独立文化教育机构的博物馆,只有私人 and 皇家的收藏室。中国当代形态博物馆的建立最早开始于法国耶稣会于1868年建立的徐家汇博物院,6年之后,又由英国人开办了上海博物院,而被认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当代形态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兴建是1905年的事。图书机构也同样经历了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变迁。1851年,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的前身——上海图书馆由英、美等国在沪殖民当局经办。1858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建立。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公共性质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也是由外人所设。这些机构一方面掠夺中国的资源、文物、古籍为外人服务,另一方面也向中国提供了近代文博机构的范式。此外,1873年3月由耶稣会建立的徐家汇观象台是当时中国最早与世界各大天文台站建有联系的机构,也是最早向中国公众定期发布气象观测报告的机构。伴随着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建立,一些新的艺术、体育和文娱形式也迅速地传入中国,现代戏院、运动场馆、公园游乐场等的出现即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这里最典型的恐怕莫过于电影了。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水浇园丁》等几部世界上最早的短片,标志着电影时代的开始,仅仅过了8个月,也就是1896年8月11日,所谓的“西洋影戏”便开始在上海徐园“又一村”与观众见面;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建造虹口大戏院,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正式电影院;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投资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为中国首家电影制片公司,此后,各种电影公司纷纷开办。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在中国发展之快,令人咋舌!各种近代社会文化机构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情趣,使“文化”由局面型、贵族性向公共型、大众型演变,而这恰是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不过,有必要指出,早期的某些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曾公然限定不向中国人开放,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类,即是这方面最恶名昭著的例子,这是殖民主义

者对中国人民的莫大污辱,也有悖于近代文化机构的发展趋向。

上述文化交流的事例,意在说明外来机构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所起的某种先导和开创作用,但绝不能由此引出一个结论,即:中国的近代文化机构是在外来文化机构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外来机构,中国近代文化机构便无从建立。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型的近代文化机构在中国也会自然产生(可能过程会慢一些)。近代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是半殖民地,外来文化才有可能以少有阻拦长驱直入的方式强制注入。中国近代型文化机构多由外人率先创立,恰恰深刻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存在。

外部因素的注入,必然在内部引起某些反应。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外域文化机构的设置,迫使长期生活在封闭天朝大国的人们承认“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世界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外来机构领风气之先,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在破坏中国封建文化的同时,又传导了当时仍属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近代意识的产生和价值观念的转换起了某种除旧布新的作用。

其次,一定程度地加快了新旧文化体制的代谢。从外国在华设立文化机构开始,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机构就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旧式文化机构(如私塾、书院、邸抄、医馆、藏书楼等);另一种是代表西学的西式文化机构。两种模式经过不断的冲撞融合,在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文化机构无可挽回地趋于衰落,西式机构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机构的主要存在类型,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新闻、医疗、体育、文娱等新体制逐步确立。诚然,这一切的发生自有其中国社会内部的原因,但外来机构无疑起了某种导向和示范作用。

再次,促进了人材的培养。有人统计,在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约有100万人,其中大学生8000人,中学生约9万人,其余为小学生和神学院校的学生;还有人估算,近代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占这一时期中国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2—15%。显然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与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不无影响，而这个群体又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除了教会学校的直接人才培养外，新风气的导入，新体制的确立，更是为中国各种近代人材群体的出现造成了必不可少的时代环境。

有鉴于此，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在性质上呈现出多样性。从主体上，我们不能排除大多数机构所带有的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具体分析情况又千差万别，有些属于比较单纯的文化机构，有些则属于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机构，这些机构都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无涉；有些机构还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某些反战机构等）。在这其中，需要审慎地区分文化侵略与文化传入的差异，宗教功能与一般文化功能的差异，政府创办与民间创办的差异，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差异，还有国别之间的差异，即便是同一机构，前后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三

近代外国文化机构在华有一个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程相联系，也与中国人民日渐觉醒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启动过程相联系。其间，1919年的“五四”运动具有某种界标作用。在这之前，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的设立在数量上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这之后，则呈逐渐衰减的趋势。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的大背景下，教会自立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相继展开，反映这些运动的最直接的成果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华文化机构部分开始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或改由中国人自行管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

一个是世俗化，就是非宗教化。早期外国在华文化机构，除了专门的教会机构外，就是学校、医院、报刊、出版和社会福利等机构，也多数由教会所创办，或与传教士有关系。各类文化机构成了基督教普进运动的工具。20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宗教色彩减弱，世俗气息渐浓，专业化日益突出，教育、文化职能与宗教职能的分离倾

向加剧,有很多机构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是本土化,就是中国化。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既是外域文化的载体,又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土壤上,本土化不可避免。关于中国化的争论很早就已开始,如明清之际的“礼仪之争”,19世纪70至90年代基督教新教教会内部关于教会学校功能的争论等等。但转折性的变化则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人民不断高涨的反帝斗争的压力下,绝大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注册,若干外国文化机构逐步由中国人接管,某些仍由外人控制的机构也开始受到中国政府法律法令的约束,就连外域文化色彩最强的教会也开始“中国化”,中国教徒自立教会大量涌现,“本色教会运动”应运而生。据本书收录的条目可以看出,20年代后来华的修会、差会数目明显减少,而由中国人接管自办的机构明显增多。对这些由中国人接办的机构,我们采用先详后略的写法,对此前外人控制时的情况详写,对国人接管后的情况略写,以契合本书的题意。

必须指出,20世纪20年代机构收回的情况很不一致。有些收归了国有,但收归国有后仍与外国有密切关系(如国立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不过,这些机构从主要方面来看已由中国政府领导,对此类明确收归国有的机构,本书原则上不录;大量机构则名义上向中国政府注册,成为“私立”,实际上仍由外人操纵,对此类机构本书依实际情况予以说明;另有部分机构则始终拒绝接受中国方面的监督,仍由外人全面控制。上述复杂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外国在华经营的成千上万的文化机构,在革命后短短几年中要么迅速解体,消失于无;要么由人民政府接办改造,成为服务于新中国的新型文化机构。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壮大和新文化机构逐步发展并取代外来机构的结果;是“五四”运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与基督教普进运动正面冲突的结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不许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领域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本书参阅和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体例关系，不能一一征引说明，敬请谅解，特此致谢！

但过往中外文化史的研究多注重思想、学说、流派、人物，而对机构等“实体”的研究似嫌不够；即使在机构研究中，也偏重于少数机构的“个案”研究，而对外国在华文化机构比较全面的搜罗整理则付诸阙如。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起步性的工作。我们是在1987年着手此项工作的，由于资料的零散，加上自身功力的不足，搜集整理过程确属不易，曾断断续续搞了5个寒暑，虽然草成此书，但仍相当粗糙，缺漏甚或错误的地方所在多有。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寄谦、王晓秋等诸位先生曾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张寄谦先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美国在华文化事业”，本书作者刘一皋、郭卫东均是该课题组的成员，本书的编纂可以算是张先生研究项目的一个副产品。张先生在百忙中曾亲自审阅了本书的编写提纲和部分内容，并多方面给予指导。拙作如有某些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扶持帮助，如有何错误，则由作者完全自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唐克敏先生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郭卫东

1992年4月于北京西郊燕园

目 录

凡 例	1
前 言	1
词目表	1
正 文	1
附 录	423
机构中外名称对照表	423
主要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449
分类词目索引	464
宗教机构	464
基督教新教差会	464
天主教修会	466
东正教会	469
教堂	469
教区与地方教会	475
神社与其他	478
教育机构	478
大学	478
中小学	480
其他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	486
宗教教育机构	487
报刊社	489
中文报刊社	489
英文报刊社	492
日本报刊社	493
其他文种报刊社(法、俄、德、意、葡、朝、蒙)	495

出版机构.....	497
广播电台与通讯社.....	498
医疗与慈善机构.....	499
医院.....	499
慈善机构.....	500
社会文化机构.....	501
图书馆.....	501
博物馆.....	501
娱乐机构.....	501
其他文化机构.....	502

词 目 表

(按笔画排列)

一画至二画

一面坡俄侨中学校	1
二十世纪	1
人民之友	1
人民论坛报	1
八面城天主教堂	1
九级浪	1
九江同文书院	1
九江儒励女子中学	2

三 画

(一)

工部局市政公报	2
工部局公众图书馆	2
士兵之友	2
士蔑西报	2
士兵的呼声	3
土山湾印书馆	3
土山湾圣衣院	3
土山湾孤儿院	3
万国公报	3
万县里头街教堂	4
万县南津街教堂	4
万国邮电基督会	4
万国改良会分会	4
万县武陵场耶稣堂	4
大同报	4

大陆报	4
大美报	5
大晚报	5
大慈园	5
大北新报	5
大西洋国	6
大同学院	6
大同神社	6
大连医院	6
大连新闻	7
大陆新报	7
大陆新闻	7
大青岛报	7
大美周报	7
大美晚报	7
大美晚报	8
大连中学校	8
大连运动场	8
大连疗病院	8
大连放送局	8
大连禁酒会	9
大美复归会	9
大韩独立报	9
大竹基督教堂	9
大连工业学校	9
大连圣爱医院	
大连妇人医院	9
大连宏济善堂	10